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

周宁 朱双一 主编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Beizhiminzhe de Jingshen Yinji
Zhimin Shiqi Taiwan
Xinwenxue Lun

计璧瑞 (著)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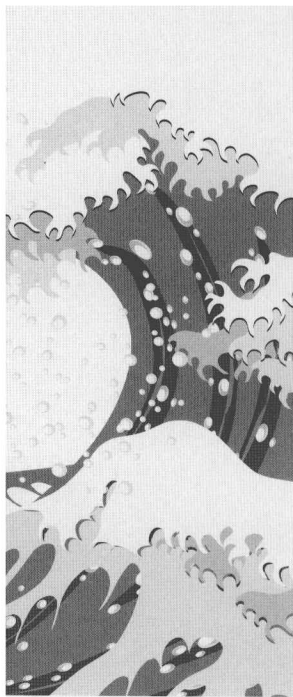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

计璧瑞 著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

周宁 朱双一 主编

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1JA750.11-44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计璧瑞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周宁,朱双一主编)

ISBN 978-7-5615-3784-8

I. ①被… II. ①计…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37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7 插页:2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刘登翰

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自然得益于那个时期从政治到经济,并且广泛影响于整个文化的“开放”浪潮。打开国门,也打开了人们的文学视野。随着一波波“台湾文学热”逐浪而来的台湾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非凡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研究,既受益于政治开放的推动,自然也不免要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维度的围限。随着时间的发展,当潮头涌过,泡沫拂去,文学(和它的研究)回到文学,一时的喧嚣便开始静息下来。从表面上看,近些年的台湾文学研究,没有了往常于政治开放的推动,自然也不免要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维度的围限。随着时间的发展,当潮头涌过,泡沫拂去,文学(和它的研究)回到文学,一时的科转入这一领域,起初跟随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先生,做了一些台湾旅美诗人的研究,继而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本岛文学的讨论上,尤其集中在潮过后回归的正常和平静。一批富于理论识见、精于文本分析、着力于扎实史料建设的中生一代研究者,始终默默坚持在台湾文学研究的第一线。在表面“冷”的背后,是实质上内涵的“热”,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难得的深入和拓展。他们和另外一批在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一起,成为这一学科研究承续有序的新的中坚。

计璧瑞博士是他们之中值得敬重的一位。她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这项研究。那时她自北大研究生毕业不久,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转入这一领域,起初跟随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先生,做了一些台湾旅美诗人的研究,继而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本岛文学的讨论上,尤其集中在台湾极有独特历史特征和学术价值的殖民时期文学的研究上。孜孜十余年,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此后在大学任教,她都始终抓住这一课题不断

深入和拓展。她是把台湾文学既作为自己的职业(她在大学一直开设台湾文学选修课),又作为自己的事业来进行的。台湾文学,尤其是殖民时期的台湾文学研究,相对于时下文学的另外一些部门,是一个不甚热闹,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寂寞的领域。加之她为人低调,性格沉静,不爱张扬,她的努力,并不大能为人所认识;甚至有时,她所坚持的学术立场,还曾引起误解。不过这一切,她都无所计较地淡然处之,以一种耐得寂寞的专注精神,在自己所认定的目标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下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是她多年耕耘的收获。彼岸的台湾文学研究,近年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是史料的大量发现和整理。由岛内各县市文化中心牵头组织对本地文学史料的搜罗与发掘,整体性地使台湾自明郑至当代以来这一漫长时段的文学事迹和著述,清晰地展露在读者面前,同时也激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潮。计璧瑞十分重视这些史料的发现,将之作为自己研究的史实背景和论说资源。然而她并不是平面的重抄这批史料,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框架,提炼自己的学术观点,展开深入的解读和诠释。她的视野集中在“殖民地台湾”这一深刻影响台湾社会文化变故的历史时段上面;然而她的观察视角和立论基点却在今天,在整个东亚,在我们这个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星球和时代。她探视和剖析的焦点是“殖民地台湾”被殖民者的精神创伤,而这也同时是我们这个不幸地球上所有被殖民者共同的心灵创伤。因此,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时,我们一方面感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深刻性,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一研究论题的当下立意,研究者鲜明的当下立场。对象的历史性和研究的当下性,二者的兼具和统一,是这部著作的鲜明特点,也使这部著作有了较高的学术品位。

这一学术品位的获得,有赖于作者广阔的理论视野和理论与对象之间诠释的契合度。在作者层层剥笋式的深入分析中,从整个论述体系的建立、立论的形成、文本的解读,到结论的推出,我们都注意到作者对理论的重视,尝试运用并初步形成一套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理论话语。早期大陆台湾文学的研究,常被指缺乏方法和理论深度不足。随着一批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教育背景下广泛接触西方各种新理论的中青年一代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这一不足有了明显的改观。然而,盲目搬用西方的新理论,甚至胡乱套用,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为读者所欢迎。理论的有效性,并非只是理论的自我生产和演绎,而在于它对于对象的实践。在这

里,理论是我们深入对象的一种方法(途径)和剖析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以及由文本所构成的整个对象,是第一性的;而理论是进入对象的手段,是第二性的。计璧瑞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出的对理论的极大重视,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她所关注的,是理论对自己研究对象阐释的有效性,是理论与对象之间互相契合的解读。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这部著作值得称道的另一个特点和优点。

在当前两岸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台湾文学的政治敏感度很高。无论统独,都十分关注文学,因此也很容易使文学越出自身而归附于某种政治或成为某种政治话题。我们虽然希望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但说说容易,做到却难。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体现的文学,虽不能等同于政治,却也不能完全与政治无关。置身如此复杂的语境之中如何坚持文学的立场,这就看不同作者的各自选择和处置。我欣赏这部著作的作者所取的态度:理性和冷静。对于两岸的诸多问题,不仅文学,还包括政治和经济,理性和冷静,或许是我们取得和谐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寥寥一点感想,是为序。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	10
第一节 殖民地台湾的特殊境遇	11
第二节 历史文献中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民族意识	23
第三节 个人化文本中的国族认同	29
第四节 冲突下的民族意识形态	
——再析个人化文本	38
第五节 殖民时期台湾文学和作家身份确认的复杂和困惑	50
第二章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	62
第一节 文化想象的发生	
——在中文写作中	65
第二节 文化想象的变异	
——在日文写作中	82
第三节 遵从殖民者逻辑的想象	
——“皇民文学”	95
第三章 文学书写与殖民现代性	107
第一节 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	111
第二节 左翼书写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论述	127
第三节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和“超越”思维	135
第四章 殖民时期文学的语言问题	146
第一节 语言文字的殖民	146

第二节	语言运动与殖民地语言困境·····	158
第三节	台湾话文论争与大陆国语运动·····	163
第四节	作为媒介和工具的语言以及日文写作中的民族文化形态 ·····	182
第五节	语言创伤的继续:第二次语言转换 ·····	190
第五章	从殖民记忆到战后论述·····	198
第一节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局部论述的改写·····	200
第二节	当代台湾文学论述演变的个例分析·····	212
第三节	两岸台湾文学史写作中的想象构成·····	231
结语	·····	243
参考文献	·····	246
后记	·····	261

导 言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特指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台湾光复(1945 年)期间在台湾产生、由台湾人创作的中文白话文或日文(其中绝大部分已译成中文)的新文学作品,以及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形成的其他新文学现象,其产生与殖民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由于台湾新文学诞生和存续于特殊的殖民社会中,它不但具有一般文学研究对象的共同特性,而且提供了汉语文学的其他领域所没有的许多独特经验,如殖民地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殖民处境下的文学传承和想象特质、殖民现代性与文学书写的关系、殖民地文学语言的转换与文学变异等等。它是整个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战后乃至当下台湾文学的一些发展脉络和基本问题均可追溯到殖民时期。本时期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文学和祖国文化的关系亦因其特殊处境而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为考察汉语文学的地缘关系和文化源流以及作家身份认同等问题提供了极佳的案例。对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不但直接影响到对台湾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细部分析,也对认识汉语文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在以往众多殖民地台湾新文学论述的基础上,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运用已有材料,以问题研究的方式,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理论方法,重点探讨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领域中有价值且有阐释空间的问题。论述对象包括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学现象、文学论争、作家经验、作品构成诸因素(想象方式和语言等)及其相互关系,重点在于分析和清理本时期本地区文学特殊性,如身份确认、文化想象演变、殖民现代性认知、语言转换导致的文学变异等问题。具体文本分析和语言社会功能探讨以新文学中的小说和部分传记文本为对象,不涉及诗歌文本和通俗

文学写作。由于殖民时期文学与战后文学的密切相关性,以及在整个中国文学场域内的特殊意义,部分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或可逸出殖民历史之外,如语言论争与大陆国语运动的关系、战前战后语言转换的深刻影响、当代台湾文学文化界关于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及战后台湾文学论述的变异和对殖民现代性的肯定与否定的认知等。具体问题包括:

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问题;

文学书写对殖民现代性的认知;

殖民时期文学的语言问题;

殖民记忆与战后文学论述的变异。

就个人论述而言,这样的方式也许可以避免个人独自建构大的史论或综论所可能导致的空泛、平淡和力不从心,以及为考虑框架的完整统一而割舍某些现象和意义,能够较灵活地选择独特的问题,同时,讨论的余地较为充裕,结构的组织剪裁也较为自如。由于大规模地全面占有海内外相关材料比较困难,从问题出发,可使材料收集相对更集中有效。这种方式可能导致的缺憾是,问题的相关性和结构的整体性可能会减弱;各个问题及其解答的分量和比重可能不够均衡等。将各不相同的问题贯穿以基本统一的分析方法,在每一个问题中注重现象的演变轨迹,增强各个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或可将这种缺憾尽可能减低。由于殖民时期台湾文学的复杂性和不同论述者立场的差异甚至对立,论述的绝对客观性是难以企及的,但坚持学术立场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这是首先要深入辨析的问题,它涉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性质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也是全篇立论的关键所在。这里重点讨论台湾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境遇、历史文献和个人化文本中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文化身份问题,以及殖民时期台湾文学和作家身份确认的复杂和困惑等。首先通过史实和比较,考察殖民者的军事占领、政治专制、经济掠夺、文化同化等一系列统治策略所造成的台湾殖民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台湾民众文化身份的模糊与丧失,并结合殖民与后殖民理论观点的应用,说明身份问题在殖民社会对立双方冲突中的重要性。身份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非常有助于认识台湾民众殖民初期到末期原有民族文化印记被逐渐涂抹的事实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或可为考察殖民时期文学特质提供阐释的基础。身份理论的介入显然提供

了用殖民理论观点说明殖民社会文化现象的机会,十分适合复杂文化问题的表述,能够清晰地辨析殖民统治及其文化同化政策对台湾民众民族文化主体的改造。

选择历史文献和个人化文本中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文化身份辨析,是寻求在殖民社会文化分析的基础上,以细部考察的方式论证殖民文化特质的具体表现形态,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方面接近历史。《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①作为《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重要构成展示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文化反抗活动及其成因的认识和评价,透过这份历史文献不但能够发现被殖民者历史实际上由殖民者所保存这一事实,而且可以观察到殖民者的基本立场和对被殖民者的态度,即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将台湾文化运动归结为民众浓厚的汉民族意识,表明对汉民族意识的坚守或摧毁实为殖民社会双方较量的实质。《双乡记》^②这部台湾知识分子传记作为典型的个人化文本成为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历经苦难的见证,对它的分析解释了一个有着“双乡的心理和心理的双乡”的台湾人曲折的认同之旅。张深切的《里程碑》和吴浊流的《无花果》同样可以作为样本,用来说明国族冲突下民族意识的多重样态,民族主义研究论述的引入有助于这种说明。

考察文学和作家多重身份的错综关系和由此而来的文学变貌是说明

① 《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实为《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一部分。《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由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原为供警察工作的参考,辑录和记述了许多殖民时期的秘密文件和历史事件。全书共分三编,《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是第二编《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的中卷“社会运动史”中的“文化运动”部分,所记述事件的发生时间由1915年至30年代中期,恰恰覆盖了台湾由民族文化运动兴起到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趋向衰落的时期。中译本完成于1975年,译者王诗琅,台湾稻乡出版社1988年出版。《台湾社会运动史——劳工运动·右派运动》也已由稻乡出版社1992年出版,翁佳音译注。《台湾社会运动史》另有台湾创造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5卷本,译者王乃信等。本文采用王诗琅译本。

② 《双乡记》副标题为“叶盛吉传:一台湾知识分子之青春·彷徨·探索·实践与悲剧”,作者杨威理,台湾省人,曾留学日本并于战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长期担任北京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1989年后赴海外定居。传记的基本材料取自叶盛吉的25本日记和手记,原著为日文,书名为《ある台湾知識人の悲劇・中国と日本のはさまで・葉盛吉伝》(《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中日两国的狭谷中·叶盛吉传》),日本岩波书店1993年。中文版由台湾人间出版社1995年出版,陈映真译。

殖民地文化与台湾新文学关系的又一关注点。本文通过台湾新文学的归属、作家文化身份、文学传承和创作语言等方面改变的辨析,试图说明殖民统治对文学的深刻影响。文学传承方面,台湾新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接受直接造就了台湾白话文学的兴盛,而这种接受又根据台湾社会的实际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批判文化传统的保守性的同时也阐发其中的合理性。由于语言的转换,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逐渐由以中文创作为主过渡到中日文并举直至完全使用日文,形成了中文作家和日文作家两大群体,文学传承也从全面接受五四新文学并在其影响下形成新文学运动,逐渐转变为以吸收日本文学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学为主;这种直接经由历史的变动所造就的作家身份和写作形态的变异正是理解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文化想象和语言问题的钥匙。

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想象”不同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文学想象方式,而主要指文本中显现的对特定文化对象的认知状况和认知态度。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表现对象及其引发的文化意义相当复杂,作家和文本的每一种立场和身份的调整都会带来想象对象、写作姿态以及文本文化意义的激发。由于语言转换与殖民时期台湾社会变化存在对应关系,本文从写作语言的角度标明作家身份类型,以考察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处境下作家和文本的想象形态;“皇民文学”作为殖民晚期文学迎合殖民统治的文化想象也被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中文写作作为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前期的主要创作形态,在对日本和台湾的想象之中,形成了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冲突、殖民社会的世相百态、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为基本结构方式和表现内容的想象形态,这种想象形态随着殖民社会的发展而呈明显的变化。以日本想象为例,单纯的、敌对的、绝对外在于台湾的殖民力量逐渐在客观上呈现出多重的文化意义,在作家民族立场没有丝毫改变的情况下,文本原有的组织直接民族冲突的构思方式发生了改变,赖和的写作已经将直接的控诉上升到对殖民社会存在的深刻质疑。中文写作的台湾想象是民族自我想象的一部分,启蒙思想和民族、阶级意识支配和决定了自我想象的侧重点和切入角度;悲苦的民众形象成为想象的重要表征;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在自我审视中更多地被想象为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显示出作家自觉的文化选择。

在与中文写作的比较中,日文写作呈现了明显的想象变异,日本不再

作为绝对外在于台湾的形象出现,它对台湾社会生活的影响激发了作家对诸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复杂文化问题的思考。同时,日本想象开始与台湾想象相融合,即在想象日本中想象台湾。自我想象一方面延续着关怀下层民众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格外关注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传统在文化想象中维系民族身份的作用得到加强,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成为殖民社会晚期文化想象的重要一翼。

对“皇民文学”的考察侧重于以这一殖民社会晚期特殊的文学现象说明殖民意识对被殖民者思维的宰制和由此形成的“类殖民者”的心灵扭曲,而不在于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和道德评价。“皇民文学”的出现源于殖民社会双方关系的演变,被殖民者在殖民初期的顽强抵抗会随着权力的逐渐丧失而改变方式甚至消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适应殖民统治,直至模仿殖民者,因而殖民社会晚期会出现完全遵从殖民者意志、自觉否定原有身份的文化想象。此外,“皇民文学”的存在及后续影响还表明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思维的侵蚀并不仅仅局限于殖民时期。

文学书写对殖民现代性的认知。殖民现代性是认识殖民地文学与文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当今现代性问题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经日本殖民统治直接导入台湾的现代性因素不仅为殖民主义合法化提供了某种文化政治逻辑,而且从制度、观念等各领域强制性地改变殖民地原有的社会形态,被殖民者对现代性的被动接受使殖民现代性形成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殖民者自认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殖民时期台湾作家集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拒斥者和批判者于一身,并通过文学书写来选择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反思与批判,显现出在传统性/民族性与殖民性/现代性关系纠葛中的多重认知。

考察文学书写对现代性表征的不同处理方式有助于理解被殖民者的现代性认知。这些殖民现代性表征被大致划分为几种形态,如观念、制度、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因素和物质性的现代化外观等。现代医学、现代教育和现代时间等成为重点分析对象。赖和对现代医学的书写流露了认同现代性和否定殖民性的冲突与对立,表现出反思现代性、批判殖民性的思想特征;周金波则通过赞美现代医学表达对现代性/殖民性的认同,使现代性完全等同于殖民性。当作家可以通过将公学校单纯地当作现代教育的标志去肯定其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时,公学校的意义单纯而正面;一旦涉及公学校的殖民特质,其殖民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会自然显露。对现

代时间因素的关注在于考察文学如何表现殖民现代性对传统生活形态的改变,考察作家如何通过对现代时间因素负面意义的否定和对传统时间正面意义的肯定间接实现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

对左翼书写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论述关系的认识在于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解去认识殖民时期台湾左翼书写的历史意义。这种尝试一方面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关注怎样对殖民时期作家对左翼思潮的认知做出解释。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理解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即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异的“革命现代性”,进而考察左翼书写对阶级意识的强调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及其与马克思现代性论述的一致性,试图说明左翼书写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以文学形态表现殖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破坏性一面和被压迫者得到解放的可能性。

被殖民者在殖民现代性认知中情感经验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这有助于寻找同一时期被殖民者形成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认知以及文化抗体强弱和形式差异的情感因素。这种尝试可能仍然不能确切说明这些情感经验的成因,但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凝固的形式”或明确的范畴之外寻求另一种说法。殖民统治引发的“痛感”和“快感”体验在文学文本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述;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些含混、“中性”的情感表现。情感经验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将情感和意识完全等同。同时,不同的情感经验怎样统合为一个时期的基本情感结构;殖民主义引发的痛感/快感及其遗存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情感经验与文学文本显现的思想倾向是否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等问题仍然有待探讨。战后台湾存在的殖民地“肯定”论和“否定”论,其焦点在于对殖民现代性认识的差异,这也与殖民时期的情感经验或记忆相关。

殖民时期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决定了殖民时期到战后一段时间内台湾文学语言运用的特殊性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学和社会政治话题。本文提出的部分概念和阐释从语言社会功能的角度论证了殖民地台湾文学语言状况的复杂性。语言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殖民者实施的“语言文字的殖民”,即语言同化,其后果是使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写作语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一改变之前、之中和之后文学写作的语言困境成为影响作家命运和文学生态的重要原因,直接造成了殖民时期新文学中文写作的被迫中止和以殖民者语言文字书写被殖民者生活的奇异景象,

也决定了战后日文写作终结的现状。在殖民社会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殖民者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被殖民者写作内涵的意识形态形成冲突;在冲突趋于隐蔽的情形下,语言的工具性则相当明显。

殖民时期的历次语言运动和语言论争的根本性质是被殖民者面对文化同化的压迫寻求文化自救、突破语言困境的种种尝试。本文重点探讨台湾话文论争双方为解决殖民地语言问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难以摆脱的理想困境,指出论争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但它们都因社会境遇、地域文化等限制,存在某种缺陷,缺乏足够的现实可行性;同时将论述扩大到大陆国语运动和大众语讨论,力图从整个中国迈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台湾话文论争的真实状态和重要意义。

语言转换中文学的哪些因素得以保留,哪些因素受到损失,是分析语言社会功能和日文写作表现民族文化形态的主要切入点。本文借助语言学理论,将语言的“潜在内容”,即不受语言形式和质料的限制,可以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媒介中而不受损失的非语言艺术的部分,称为语言的非物质性,考察这种非物质性在日文被作为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弥合语言种类的文化象征意义与写作者身份和文本意识形态之间冲突的功能。这种非物质性在日文写作中有不同的表现层面,首先,当日文被作为媒介和工具描述被殖民者处境的时候,台湾人的命运和生活图景并未因日文的使用而发生变形,在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日文作家那里,文本意识形态内涵的强调恰与语言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成鲜明对比;第二,日文的使用没有对文本内容“台湾属性”的表现造成大的障碍;第三,部分表现人的存在状态的日文写作彻底超越了语言本身的文化象征意义。总之,日文写作的成熟伴随着日文逐渐脱落其民族文化属性、走向纯粹工具化的过程,但其被殖民特征并不能被忘记。

战后的第二次语言转换对日文写作带来的冲击显示了有着合理外壳的战后语言政策与台湾社会实际步调的错位,表明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语言转换的内在渐变规律和外在突变现实的激烈冲突,会使殖民地民众在回归民族文化身份后仍可能遭受失语的痛苦和心理的伤害。

殖民记忆与战后文学论述的变异。这一问题是就当今“本土化”台湾文学论述对殖民时期文学和战后文学论述的改写所作的分析,试图通过现象的辨析显示改写背后的动机及其与台湾社会思潮变迁的密切联系。战后台湾文学论述在近20余年中的急剧变化,客观上与“本土化”思潮的

兴起直接相关,本质上仍是研究者对历史再度想象的产物。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局部论述的改写表明论述对象已被当作历史资源参与了“本土化”文学论述的建构。对张我军文学主张及“皇民文学”评价的变化即代表着“本土论”者通过文学论述改写寻求“去中国化”的文化政治目的。“本土意识”兴起后,作为历史资源的张我军的理论主张开始不能满足显示“本土意识”的台湾文学论述的需求,甚至与“本土化”论述形成矛盾,而逐渐受到质疑以至被“荒谬化”。质疑和“荒谬化”的焦点集中于张我军对台湾特殊性的“忽略”,这一点无助于“本土性”的建立,因此他的文学史地位才发生了变化。“皇民文学”评价改变的原因与此相同,“本土论”者对“皇民文学”的热切关注目的不在于“去殖民”,而是呼吁“同情、理解”“皇民文学”,以屈辱的被殖民历史经验作为资源,对抗所谓“中国民族主义”。这也说明为对抗“中国意识”,“本土意识”并不拒绝与殖民意识合流。

台湾文学史写作者叶石涛对台湾文学概念的建构和置换也是台湾文学论述演变的一部分,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轨迹与“本土化”文学论述的成长和特质相一致,是一个不断提升台湾“本土”文学的重要性,建构“台湾文学”话语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为台湾本土文学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始,到具有明显的权力意识和排它性,最终时时沦为政治论述。

两岸有代表性的台湾文学史论述是想象台湾文学的不同立场和方式的抽样,从中可以考察文学史想象的成因、写作者想象变异的表征和运作轨迹;分析不同的文学史想象对现象的彰显或遗忘,说明这些彰显或遗忘的动机和效果。这些文学史文本的出版时间几乎一一对应,可以显示同一时段两岸想象的对比和差异;它们又各自形成链条,表明自身前后的想象变化。考察以部分重要史实和现象为坐标,阐发文学史想象对历史资源和文学传统的利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和再评价、对台湾文学概念的解说和地位性质的认定等问题,说明不同时段的不同想象可能赋予文学史写作以历史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以及文学史文本与社会语境的“互文本性”。文学史写作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大陆版写作的想象构成、想象立场和方式相对稳定;台湾版写作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台湾社会变迁、权力更迭以及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变动,使部分人认为需要修改论述以影响现实。

由于分析对象文学和文化意义的丰富性和多层面,上述问题的探讨仍然是初步和有限的,在论证的严密系统和深入细致以及新问题的发现

等方面仍有相当大的改进余地和研究空缺,这些余地和空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可以由研究者直接推进和深入,却因多重原因未能得到充分探讨的重要问题,如在东亚现代化时空内,台湾文学书写对日本的认识相比其他区域的特殊性;日文写作语言意识形态与文本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在表现;文化想象的其他形态等等。二是受制于主客观条件暂时无法获得重大进展的问题,如日文作家写作心理、日文写作艺术表现以及文学传承的具体细节等。无论如何,问题解答上的空缺或可为今后的探讨提供新的空间。